

49 岁半路出家

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,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,并且文盲占了很大比例。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,没有统一的、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,是不可想象的。因此,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,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。

1955年10月,为了进一步规范简化汉字,提高认知率,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,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、英、法、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。会后,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:“你不要回去了,留在文改会工作吧。”周有光说:“我不行,我业余搞文字研究,是外行。”胡愈之说:“这是一项新的工作,大家都是外行。”不久,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。就这样,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,而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、一位语言学家。

1906年1月13日,周有光出生于江苏省常州青果堂唐氏八宅之一的礼和堂。幼时,有学养的祖母就喜欢用古诗词熏陶周有光。1923年,周有光中学毕业,成绩优异,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,主修经济学,但对语言学的爱好让他选修了语言学。他进的是教会学校,一上大学,就用英文打字机,用起来非常方便,而中文则只能用毛笔写。彼时,周有光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
1927年至1948年,周有光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,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。周有光在美国工作和学习期间,有幸面见爱因斯坦,这种经历在今天看来,富有传奇色彩。周有光说,“他非常随便,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。”他对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记忆深刻:“一个人的一生到60岁为止,工作是13年,除了吃饭睡觉之外,业余时间有17年。能不能成功,就看你怎么利用你的业余时间。”

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,周有光提出口语化、音素化、拉丁化的基本原则,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。周有光主持制定的《汉语拼音方案》,自1958年2月全国人大批准后开始进入大陆每一所小学的课堂。1982年,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(ISO7098)。说起“汉语拼音之父”时,周老挥舞起他雪白的手帕连连摆手:“这个不敢当,这个不敢当。当年做拼音方案,主要是三个人,叶籁士、陆志韦他们两人还有其他工作,我只是做得多一点而已。”

周老接着说:“我本来名字叫周耀,民国后,时兴不取字了,只取名,并且时兴取双名,我就成了‘周耀平’了。在省常州中学上学时,我和吕叔湘是同班同学,那时候与吕叔湘一样对语文很感兴趣,常常相互讨论。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时,主修经济学。不过,大学里有选修课,我就选修了语言学。后来也写了几篇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,但因为是语言学的外行,就不敢用本名发表,因为我原来名‘耀’,自己起了个假名字‘有光’,后来‘假名’成了‘笔名’,再后来‘笔名’就取代了‘真名’了。我现在是‘周有光’替代了‘周耀平’,‘语言学家’替代了‘经济学家’,以假乱真,乱套了。”

在美国国会图书馆,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,也藏有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。



徜徉在『被上帝遗忘』的时光里

◆ 王成



■ 周有光与夫人张允和

古往今来,学术界、文艺界乃至社会各界,都有一些被称为大师的人。人们崇敬大师,但往往并不清楚大师“大”在何处。今年已经107岁的周有光的一生就很传奇。他学术跨界,49岁转行却颇有建树;他爱情美满,娶了大名鼎鼎的九如巷张家四个女儿之一张允和;他笔耕不辍,106岁还出新书《朝闻道集》。周老说自己是“被上帝遗忘的人”,接下来的日子,他说自己什么都不做了,要喝着红茶和苹果泥,静静享受“被遗忘”的时光。

“周百科”幸福一辈子

叶圣陶曾说:“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,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。”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,照片背面是沈从文写的“张家二姐作新娘,从文”。因为敬佩周有光的博学,连襟沈从文曾送他“周百科”外号。

“最后的闺秀”张允和被形容为“年轻时她的美,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”,亲友们用“侠肝义胆”来赞誉她,她却称自己是一个“标准的家庭妇女”。

张家原籍安徽合肥,可算当地名门望族。祖父张树声为晚清重臣、淮军名将。父亲张武龄在“五四”运动后,受到新思想的影响,于1921年变卖部分家产创办了著名的“乐益女子中学”。张允和有六个兄弟、三个姊妹。四个姐妹中,大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,二姐张允和即为周有光的夫人,三姐张兆和的丈夫是作家沈从文,四妹张充和嫁给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。

张允和16岁时,暑假里到周有光家玩就认识了周有光,那时他在大学里念书,而张允和正读初中三年级。之后这个男孩就总去找她,这一次,周有光的浪头冲破了张允和的石堤。他们一起到江边散步,开始了甜蜜的爱情长征。他们在石堤上坐下来,两人都紧张得没有一句话。周有光拿出一本小书来,张允和看了一眼,心想:这个人真坏啊,拿了一本莎士比亚的书,英文本的,怕我不懂英文啊。书上



■ 百岁老人的小书房与小书桌

乐观豁达的百岁老人

“上帝太忙,把我忘记了。”2012年1月13日,周有光先生迎来了107岁生日。107岁的周老仍每日坚持博览群书、笔耕不辍,每个月至少发表一篇文章。特别“潮”的是,他还在新浪网上开设了博客,人气很旺,粉丝无数。2011年上半年,一家出版社刚刚出版了周老的一本新书《拾贝集》,这本书,无疑是目前国内最高寿者的最新作品。

“仁者寿。”胸怀广阔的周有光先生至今身体健康,生活简单。他阅读古今中外书刊,随时笔记一闻一得,自得其乐。他对世界充满好奇,新鲜事物都愿意体会。102岁的时候,他在亲友的陪同下去郊区泡温泉,对一个2岁的小朋友说:“我只比你大一百岁哩。”北京五号线地铁开通不久,他坐着轮椅乘了一遍。

“中国有句老话,叫做长命百岁。100岁是人的生命极限,超过极限是有的,但那是例外,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处例外了。上帝太忙,把我给忘了……不叫我回去!”这位历经晚清、北洋、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的“四朝元老”风趣地笑言自己“四世同球”,原来他的孙女和重外孙现居美国,他隔天就用“伊妹儿”和他们通讯。

“有一次,我去医院做检查,我写了97岁,医生给我改成了79岁。又有一次,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,我说‘年轻时患过肺结核,患过忧郁症。结婚的时候,算命先生说我们夫妇俩只能活到35岁。是医学改变了我的寿命。’”难怪医生自作主张,周有光老人除了耳背眼花,其敏捷的思维和健康的体态与真实年龄形成的反差的确实令人惊叹。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,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度量要放宽一点。“老人每当写文章累的时候,就会做一下他独创的‘象鼻子运动’扶着桌脚,晃晃头、耸耸肩、扭扭屁股、伸伸腿……小小的运动锻炼了全身,难怪他至今连牙齿还是“原装”的。

周老谦逊地说:“我想健康最重要的就是生活

面写着一句话: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来洗清我的罪恶。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,是罗密欧对朱丽叶说的。尽管允和没有让有光达到在一吻中消除“我的罪恶”的目的,但允和对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周有光在他的第一封情书里还是担忧地说:我很穷,怕不能给你幸福。张允和马上回了一封十张纸的长信,所表达的只有一个意思,那就是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。对于有光,更令他鼓舞的是允和的父母思想开放,支持他们的自由恋爱。

1933年,两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年轻人终于举行了婚礼。婚礼新式而简单,来的人却非常多。结婚一周年的那一天,允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小平,接着小平又有了妹妹,一家人的生活和睦睦,平静安详。然而不久后,抗日战争爆发了,张允和与周有光带着两个孩子开始大逃亡的艰难岁月。六岁的女儿小禾不幸病死,儿子小平又被流弹打中,差一点丧命。

1998年,国际教育基金会评选中国百对恩爱夫妻,周有光、张允和成为入选者中年龄最大的一对。“人家问我们,你们的生活为什么能和谐呢?”周有光拿出白手帕,擦擦嘴角,笑眯眯地说:“古代讲举案齐眉,我们两个上午喝茶、下午喝咖啡,都要碰碰杯子,我们叫举杯齐眉。这个小动作好像是玩意儿,其实有道理:就是说夫妇不仅要有爱,还要有敬。要敬重对方,双方才会和谐愉快。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离婚啊,一些人结了婚就不尊重对方了,就老吵架。家庭不愉快其实是很痛苦的。你下班回来,家庭愉快,就会得到很大安慰。”

老伴张允和在世时,两人相敬如宾,据说一辈子没吵过一次架。“想不通的时候,你拐个弯就通了啊。”2002年8月,张允和仙逝,享年92岁。“我们结婚70年,忽然老伴去世了,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慢慢地,隔了半年以后,人才稳定下来。我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:个体的死亡,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。这么一想,我才安下心来,毕竟生死是自然规律。”

有规律,同时胸襟开朗是重要的。健康有物质一方面,有精神一方面。”

就物质方面来讲,周老的要求不高,主要强调生活有规律。他说:“我现在有‘三不主义’。一不立遗嘱,二不过生日,三不过年节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,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。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,不吃油煎肉类,主要吃鸡蛋、青菜、牛奶、豆腐四样。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,鸡蛋一天一个。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。我现在的简单生活:睡觉、吃饭、看书、写文章。生活比较有规律,不乱吃东西,不抽烟,少喝酒,喝酒喝点啤酒。很少吃补品,人家送来的补品,我也不吃。以前一个医生告诉我:大多数人不死是饿死而是吃死的,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。”

就精神方面来讲,周老非常重视涵养,首先强调胸襟要宽广。他说:“许多人问我长寿之道,我想不出什么道理,可是我相信不要生气。因为外国一位哲学家说:‘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’这完全是对的。胸襟要宽大,在世界上许多事情不可能样样都顺利的,吃亏就吃亏一点。佛教里有一句活:‘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,你的精神就痛苦了。’”



■ 百岁老人有好多粉丝